

Überausgische Interpretationen der Chinesischen Kultur.
seas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tion de la culture chinoise à l'étranger

中國文化の域外における解説

해외에서의 중국문화의域外における解説

L'interprétation de la culture chinoise à l'étranger
Überausgische Interpretationen der Chinesischen Kultur
seas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L'interprétation de la culture chinoise à l'étranger
Überausgische Interpretationen der Chinesischen Kultur
seas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张西平 顾钧◎主编

中国文化的域外解读

Überausgische Interpretationen der Chinesischen Kultur

Overseas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L'interprétation de la culture chinoise à l'étranger

해외에서의 중국문화의域外における解説

中国文化的域外における解説

Überausgische Interpretationen der Chinesischen Kultur

Überausgische Interpretationen der Chinesischen Kultur
seas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tion de la culture chinoise à l'étranger

Überausgische Interpretationen der Chinesischen Kultur
seas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tion de la culture chinoise à l'étranger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зарубежом

中国文化的域外における解説



范大学出版社

张西平 顾钧◎主编

中国文化的域外解读

中国文の域外における解読

中国文の域外における解読

Overseas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中国文の域外における解読

中国文の域外における解読

中国文の域外における解読

中国文の域外における解読

中国文の域外における解読

中国文の域外における解読

中国文の域外における解読

中国文の域外における解読

中国文の域外における解読

中国文の域外における解読

中国文の域外における解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的域外解读/张西平,顾钧主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4
ISBN 978-7-5675-0549-0

I. ①中… II. ①张…②顾… III. ①中华文化—文
集 IV. ①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6928 号

中国文化的域外解读

主 编 张西平 顾 钧
项目编辑 宋坚之
审读编辑 杨 凯
责任校对 胡 静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江阴市天海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14
字 数 248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0549-0 /G·6358
定 价 32.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目录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海外汉学研究 张西平 / 1

俄国的知华之旅与俄罗斯作家的中国记忆 张建华 / 9

尼·古米廖夫的中国情结 黄 玫 / 18

俄国文学中的中国：普希金 柳若梅 / 31

20 世纪初俄国知识界对中国的思考

——从皮利尼亚克笔下的中国形象谈起 何 芳 / 40

中英文化的碰撞与协商

——解读威廉·燕卜苏“中国作品”中的文化、身份和种族问题 张 剑 / 55

英国人的汉语观与中华文明的优劣说

——17、18 世纪旅华英国人对汉语的认识与评价 叶向阳 / 64

中国的图像与图像的中国

——约翰·汤姆森与中国形象 姚 斌 / 91

罗素眼中的中国文化

——读罗素的《中国问题》 程熙旭 / 101

论赛珍珠的英译《水浒传》 顾 钧 / 109

宇文所安辨异与求同的英译策略 梁 颖 / 116

20 世纪 60—70 年代法国“原样派”知识分子的中国观 车 琳 / 131

论孟德斯鸠笔下的中国形象 张海英 / 149

桂花之香——中国文化的韵味

——记瓦列里·彼得罗夫的游记《关于中国的书》 陈 瑛 / 158

芬兰人的中国形象启蒙 李 颖 / 166

多元文化的融合体

——论村上春树笔下的在日中国人“杰” 杨炳菁 / 175

清初来华耶稣会会士的儒学观

——以《中国哲学家孔子》书中构建的“孔子”形象为例 罗 莹 / 185

Chinese Influences on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德日进中国回忆) Michele Ferrero(麦克雷) / 197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海外汉学研究^①

张西平

—

Sinology 在西文中是指“研究中国社会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地理、考古、工艺科技等各种学问的综合性学科”。它和 China Studies 的区别在于,后者的研究范围包括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研究,因而,在中文中称为“中国学”。当中国学术界开始关注国外对中国的研究时,在如何界定国外的中国研究上至今仍有分歧,但大多数人认为,应将国外研究历史文化之中国的学问称为 Sinology,国外研究当代之现实中国的,我们姑且称为“中国学”。中国学术界将 Sinology 翻译成“汉学”,西方学者在理解时要注意两点:其一,这里的“汉学”不是中国历史上所指的汉代那种研究经学时注重名物、训诂,因而后世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的“汉学”,或者清初那种继承这种学风的乾嘉考据之学。也就是说,这里我们讨论的“汉学”是指国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问,不是中国历史上那种“汉学”。也正是为了表示这两种不同的“汉学”,在中文学术用语中常常用“海外汉学”,以示区别。其二,中国学术界所使用的“汉学”也和西方所理解的 Sinology 有一定的差别。因为,在西方的东方学体系中,Sinology 只是指以汉族学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问,而藏学、蒙古学、满学等学问一般不在西方的汉学系中,而是在中亚系中。但目前中国学术界所说的“汉学”是包括了藏学、蒙古学、满学这些内容的。简而言之,国外关于历史中国之学问,我们称之为“海外汉学”,国外关于当代中国之学问,我们称之为“中国学”。

中国学术界为何关注国外汉学界对历史中国的研究呢?难道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能高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吗?这是因为,作为后现代化的中国在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学问传统上近代以来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这种重大的变化是和西方汉学有关系的。从 1905 年晚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以后,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无法按照几千年来的学术传统来表述中国的知识和思想,像以往那样在“经、史、

^① 本文“La sinologie à l'étranger: le point de vue de 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以法语发表在法国 *Le comparatisme en Chine aujourd'hui* 杂志上发表(2011 年 1 月),现将该篇中文译文作为本书序言。

子、集”的范围内展开自己的学术活动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此时，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知识体系建构和表述方式开始从传统的研究方式转变为西方的实证研究方式，对中国自己知识体系的理解，开始从“经、史、子、集”分类向现代西方学术所确立的历史、哲学、文学、考古、社会学等现代学术体系转化。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开始的这种转变有多重的原因，但西方汉学研究的影响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近代以来在中国活动的西方汉学家启示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的治学方式转向按照西方的现代学科分类来做自己的学问。例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1909年来到中国，他将其在敦煌发现的部分敦煌写本精品，出示给在京的中国学者罗振玉等人，中国学术界由此知有敦煌遗书。罗福苾和陆翔分别在《国学季刊》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上翻译发表了伯希和编制的所获部分敦煌汉文写本的目录（*Catalogue de la collection de Pelliot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由此，开启了中国敦煌学的研究。又如，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1889—1978）的《中国音韵学研究》（*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作为一部重新构拟古代汉语语音系统的奠基之作在中国发表后，受到赵元任、李方桂等中国现代语言学代表人物的高度评价，并由此使中国语言学的研究脱离了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的路数，开启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之路。

这就是说，中国学术现在这样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式是在受到包括西方汉学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不搞清楚西方汉学，就无法搞清中国自己的近代知识体系变化的历史过程和原因。从表面看，我们在研究西方汉学史，似乎是做国外的学问，实际上，这也是做我们自己学术史的学问。这反映了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知识的交流和相互的影响。

如果说，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西方汉学的关心是和自己的学术变迁有关，那时对西方汉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知识论上，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对海外汉学的研究的兴起与整个学术界对传统的教条主义的学术体系反思是联系在一起的，对汉学的热情几乎和清末民初时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即对域外汉学的介绍是同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和观念的重建联系在一起的。但此时，如果和清末民初对西方汉学的介绍学习相比，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对从事海外汉学研究的学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自觉地将对汉学的研究纳入了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对域外汉学的研究由此摆脱了主要在历史学中展开的局面，从而开启了对多学科对域外汉学的研究，其研究开始走出单纯的知识论的范围，开始从跨文化的

视角审视这个发生在中国以外的关于中国的知识和文化系统。

二

比较文学与海外汉学研究在中国紧密相连可以从两个基本事实来证明。其一,乐黛云先生早在1996年和1998年就分别主编了《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和《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两本书,将海外中国学的研究直接纳入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之中;其二,我们可以从当前中国学术界关于海外汉学研究最有影响的学术辑刊的有关文章看出比较文学与海外汉学研究的内在关系。《国际汉学》是1995年在商务印书馆创办,由已故的中国著名学术大师任继愈主编的当代中国第一份专门介绍域外汉学并对其展开研究的杂志。《国际汉学》第八辑上已故的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研究者周发祥先生发表了《国外汉学与比较文学》一文,文中提出“国外汉学所固有的比较性质”是中国比较文学界可以展开研究的重要领域。《国际汉学》第九辑上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孟华教授发表了《汉学与比较文学》,她在文章中指出:“汉学家的工作(译作、评论、研究文章)为比较学者提供了研究中国文学、文化在异域流播的基本资料。作为翻译者、介绍者或研究者,他们都是中国文化的直接接受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汉学史,往往就是一部中国文学、文化在他国的流播史。”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汉学研究的成果代表了一种“他者”的视角。所以,孟华认为,汉学是比较文学的天然盟友,“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从我踏上比较文学学术之路起,汉学研究就始终伴随我左右,成为我学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①。张西平在《国际汉学》第十二辑发表的《汉学研究导论》开始系统关注比较文学方法对汉学研究的价值,特别是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严绍璁先生在《国际汉学》第十四辑所发表的《我对国际 Sinology 的理解和思考》一文更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全面阐释了汉学研究的立场、方法。严绍璁认为,从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的角度来看,对域外汉学的研究应该有四个方面:“首先需要掌握中国文化向域外传递的基本轨迹和方式”;“其次,则需要掌握中国文化在传入对象国之后,在对象国文化语境中的存在状态——即对象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容纳、排斥和变异的状态”;“再次,则需要探讨世界各国(对具体的学者来说当然是特定对象国)在历史进程中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中形成的‘中国观念’”;“最后,则需要研究和掌握各国‘Sinology’在其自身发展中形

^① 参阅孟华《汉学与比较文学》,载《国际汉学》第9辑,大象出版社,2003年。

成的各种学术流派,并由此而研究掌握各个国家‘Sinology’的学术谱系”^①。严绍璪的这四点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学术界展开域外汉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先生在《国际汉学》第十六辑发表了《文化自觉与国际汉学新发展的一点思考》一文,作者高屋建瓴,从当前发展的中国的形势出发,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知识界一定要走出西方中心主义,树立文化自觉的观念。她认为:“将中国文化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之中,研究它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使其成为正在进行的全球文化多元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我们过去从未遭遇,也全无经验的而一个崭新的领域。”^②乐黛云先生认为,相对于对“西学东渐”的研究,从反方向,即从“东学西传”的角度展开研究,特别是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文化的影响的角度的著述还很少,而这个领域正是比较文学得以大展身手的地方。

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界自觉地将海外汉研究的领域纳入其学术研究的范围,从而在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始涌现出一批较有影响的关于域外汉学的研究,成为近三十多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当前中国比较文学界把握海外汉学研究大体从两个角度展开。一个是传播史的角度,一个是影响史的角度。

从传播史的角度展开的研究著作首推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严绍璪的《日本中国学史》,这本1991年出版的著作直到今天仍是学者案头必备之书。作者采取原典实证的方法,清晰地梳理了中国文化在日本传播的途径、阶段,及日本汉学发展演进的历史过程。在其影响下,张西平的《中国和欧洲早期宗教与哲学交流史》、《欧洲早期汉学史》大体走的也是传播史的研究路线。已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比较文学研究室主任周发祥所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丛书》中《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国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四川大学比较文学学者王晓路的《西方汉学界对中国文论研究》,南京大学钱林森先生的《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古典戏剧和小说》、《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古典诗词》、《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现当代文学》,基本上都是从传播的角度,侧重汉学的维度展开研究的。

从影响史的角度展开研究的首推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孟华1992年出版的《伏尔泰与孔子》,这本书篇幅不大,但选题重大,并开辟了了在影响研究中注重原始文献、注重思想文化史历史背景的研究,作者较好地显示了其受法国比较文学学派训练的特点。1996年出版的上海外国语大学卫茂平教授的《中国对

① 参阅严绍璪《我对国际 Sinology 的理解和思考》,载《国际汉学》第十四辑,大象出版社,2006年。

② 乐黛云,《文化自觉与国际汉学新发展的一点思考》,载《国际汉学》第十六辑,大象出版社,2007年。

德国文学影响史述》、1998年出版的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钱满素的《爱默生与中国》、2000年出版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吴泽霖教授的《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书,这些书的出版大大推进了影响史的研究。

目前,在中国学术界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已经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最为活跃的一个领域。由于对域外汉学研究的跨文化属性,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无论在基础建设还是在理论建设上都亟待深入和提高。

从基础建设来说,我们仍需回到乐黛云1996年起编辑《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和《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这个思路上来,没有对中国文化在域外传播历史的基础性研究,没有对域外汉学基础性文献的翻译和整理,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展开对汉学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严绍璦提出的原典实证的方法仍是展开汉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如果从传播到日本算起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如果从传播到欧洲算起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而中国学术界对其研究不到百年,真正学术性的展开不过三十余年。至今,我们仍不能完全拿出中国文化在任何一个国家传播的基本书目,^①仅此就可以说明一切才刚刚开始。

对域外汉学或中国学研究的领域也亟待扩展,目前中国学术界几乎将对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研究的全部精力放在了东亚和欧美,对这两个地区之外的汉学或中国学研究我们所知甚少。近百年来,欧风美雨、以日为师几乎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主流,但在中国迅速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的时刻,在中国的国家利益遍及全球的时刻,我们已有的知识显然已经不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知识范围的扩展也不仅仅是一个单纯为了国家的利益问题,这种知识和视野的扩展也包含着一个大国的知识界应该具有的全球精神视野和整个人类文明的情怀,正像在语言研究上如果没有对古埃及文字的研究,没有对两河流域线性文字的研究的话就很难称得起语言大国一样。如果把对海外汉学的研究仅仅局限在东亚和欧美,我们就很难说清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和价值,很难在多元文化的视角下展开跨文化的对话与研究,从而真正在多元文化的对话中创造出中国自己的跨文化研究理论,对世界的比较文学研究有所贡献。

从理论建设的角度来看,以域外汉学为中心的研究视域对比较文学原有的理论提出了多重的挑战,域外汉学在学术形态上几乎涵盖了中国学术和文化的所有方面,中国文学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中国的历史、宗教、哲学、科学常常是汉学的

① 严绍璦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代表中国学术界对汉学研究基础性工作的一种努力,应沿着这个方向展开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目录的编制工作。

重要的内容。比较文学所常用的平行研究或影响研究,实际上都无法说明汉学学术形态的复杂性。如何解释作为知识系统的汉学成就?这些仅仅在比较文学的领域都无法说清。这是一种全球化后知识和思想的交融与会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里既有思想的误读,也有知识的传播。域外汉学在不同的地域和国家又有不同的形态,在一个国家不同的时期又有不同的特点。如何综合考察汉学的文化形态与特点,及其形成的规律与本质,仍是一个未有定论的问题,似乎到目前为止尚无一套较为全面的跨文化理论对其做总体的说明。这些都是有待于中国比较文学界努力的。

三

或许这样向法国的朋友们介绍我们展开的比较文学和海外汉学的研究时,仍然比较抽象,现在我们从一个具体的个案研究来说明在中国展开对海外汉学的研究为何必须与比较文学结盟,或者说为何必须运用比较文学所提供的方法和理论。

我个人认为,西方汉学经历了三个主要的阶段: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在我们展开对其中任何一个阶段的汉学的研究时都需要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

例如,在传教士汉学阶段,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会士柏应理(P. Philippe Couplet, 1624—1692)在“礼仪之争”中返回了欧洲,并在巴黎出版了《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这是一本在欧洲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书,也是中国哲学首次被翻译成西方的语言并在西方出版。为研究这本传教士汉学时期的代表作,我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从两个角度展开探讨。

首先,从文化传播的角度,采取实证的方法,考察这部书的成书史,它是谁翻译的,谁出版的。柏应理等主编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并不是一蹴而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从罗明坚(P. Michel Ruggieri, 1543—1607)开始,来华耶稣会会士就一直将翻译儒家的经典作为其基本的任务。17世纪中叶,金尼阁(P. 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将五经翻译成拉丁文,并附有解释,书名为 *Pentabiblion Sinense*。此书天启年间(1626年)印于杭州,但很遗憾,书未流传下来。耶稣会会士郭纳爵(P. Ignace da Costa, 1599—1666)曾经将《大学》译成拉丁文。^① 1662年

^① Le P. Louis Pfister, S. J.,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 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226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第一版。

殷铎泽神父刻于江西建昌府,题为《中国之智慧》(*Sapientia Sinica*),其中除了《大学》之外,还有孔子的传记,以及《论语》第一章前五节的译文,他称为《上论》。这本书共 93 页,1 页前言,2 页孔子的生平,24 页《大学》的译文。此书现藏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① 1667 年(康熙六年),殷铎泽又在广州刊印《中庸》,但未完成;过了两年又续刻于印度果阿。题为《中国政治道德哲学》(*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内有殷铎泽写的一篇短序,54 页的《中庸》拉丁文译文和 8 页的孔子的书目,在 *Adiacnte con la Vita di Confucio* 一书中出版。这样,殷铎泽所译的《中庸》除了广州和果阿版以外,也有了欧洲版本,从而产生影响。

《中国哲学家孔子》就是在以上基础上形成的。它的成书的关键是在杨光先教难中,在华的传教士全部被集中在广州,在广州会议上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以统一的名词来称呼天主教所敬礼的唯一真神,用天主还是上帝? 积累了数十年传教经验的耶稣会会士们自然会进一步推进“适应策略”。柏应理在此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次,我们可以从翻译的角度研究这本书的变异性。《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出现可以看作是利玛窦“适应策略”在 17 世纪的持续性结果。但作为“他者”的孔子和儒家思想,在耶稣会会士的眼中也发生了变异,因为他们所介绍的孔子是传教士眼中的孔子,他们无疑是从天主教的理论和思想出发来解释孔子及儒家的。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国哲学家孔子》时必须注意他们这种“变异性”的解释。这种变异性表现在:首先,对中国远古思想和孔子言论的神学化解读;其次,作者认为中国人是上帝的子民,中国上古时期就有信奉上帝的传统。在文本之余的阐释中我们也可看出耶稣会会士们对中国思想的观点。在对《中庸》中孔子谈论鬼神的一段话进行翻译后^②,耶稣会会士们评论说:孔子是信奉上帝的。理学家们把终极的力量解释为阴和阳,冷和热,善和恶或者光明和黑暗的转换是不对的,这一切都应该是上帝掌管的东西。《书经》中曾说舜曾经祭祀过上帝。

如果没有跨文化的视角,没有比较文学的方法,我们是很难说清《中国哲学家孔子》这本书的。

① 参阅 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5 vols. Paris, 1905-1906, 2: col. 1386,也可参看 *L'imprimerie sino-europeenne en Chine*, Paris, 1891, 16-17. 或 C. R. Box "Some Sino-European Xylographic Works, 1662-1718", *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4. 1947, p199, p202.

②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耶稣会会士们的解读见《中国哲学家孔子》中对《中庸》的翻译(第 50 页)。

天地旋，寰宇变。当代中国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以超出任何人的想象的速度骤然崛起。通过对域外汉学的研究，探求中国文化的普世价值和全球意义已经成为我们这代人的使命，而在跨文化研究中，比较文化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方法。在对海外汉学的研究上，中国学术界无论在学术的基础建设上还是在理论建设上，都还刚刚起步。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俄国的知华之旅与俄罗斯作家的中国记忆

张建华

从1618年一位名叫伊凡·佩特林(Иван Петлин)的托木斯克的哥萨克来到中国,写下关于中国的介绍一直到今天,俄罗斯对中国的认知史有了将近四百年。从那时起,中国——这个被俄罗斯人称为“亲近且又遥远的世界”^①便深深地印在了历代俄罗斯文化精英,特别是作家的记忆中,中国不仅成为他们了解、认知、探究东方的重要对象,也成为他们认知世界、认知自我的重要路径。

的确,在这近四百年的交往中,两国的关系中有过坎坷、曲折、贸易冲突,甚至军事对抗。比如,19世纪70—80年代,亚历山大二世宫廷曾经有过对华作战的构想,俄军总参谋部的一位上校普尔日瓦利斯基甚至制定过准备与中国作战的具体方案。20世纪初,俄国参与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八国联军。1929年,因为在远东边界发生的中俄军事冲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ЦИК)和苏联人民委员会(СНК)曾作出《关于苏联终止与中国交往的决议》,同年秋天,红军元帅加伦直接指挥了远东的军事行动。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俄发生过众所周知的珍宝岛军事冲突。

然而,在中俄关系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友好的交往,是俄罗斯文化精英,特别是俄国作家对古老中国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强烈兴趣和持久的、深深的关注。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在俄国与中国两大民族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精神上的联系,他们必须手携手地并肩前进”^②。

俄罗斯民族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认知,俄罗斯作家对中国的历史记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百年:“介绍中国”的第一个百年(18世纪);“经院汉学确立”的第二个百年(19世纪);“汉学繁荣”的第三个百年(20世纪)。

在17世纪,就有最早的俄国友好使团来到被称为“天下帝国”(Поднебесная

① Романенко А. Д., Китай у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АЛГОРИТМ, М. 2008, С. 5

②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六卷,周圣、单继达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326页。

империя)的中国的记载与报道^①。到了1715年,俄国在北京设立了第一个传教士使团。1770年,俄国的启蒙作家诺维科夫-普里波伊(Н. Новиков, 1744—1818)在他创办的《雄蜂》(Трутень)和《闲话人》(Пустомеля)两本杂志中首次刊登了列昂季耶夫(А. Л. Леонтьев, 1716—1786)从中文和满文翻译的关于中国的译作。列昂季耶夫是俄国第一个懂汉语的翻译家,他一生中共翻译了20多本中国的书籍。18世纪末,俄国第一个革命作家拉吉谢夫(Радищев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749—1802)就在他的创作中表达了对东方中国的关注。他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于1792年写下了《关于同中国贸易的信》。

俄国“经院汉学”的确立是在19世纪。其背景是中俄关系有了较大的发展,两国人员之间的接触与往来也在增多和深化。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俄罗斯在北京设立了使馆,在上海等城市设立了领事馆。1896年签订了《中俄联合防御条约》以及建设后贝加尔到满洲里铁路的协议。

“经院汉学”确立的标志是:首先,俄国汉学奠基人亚金夫(Иакинф 即比丘林 Бичурин Никина Яковлевич, 1777—1853)的出现。他作为俄国驻北京的东正教使团大司祭在中国逗留了11年之久(1840—1853),通晓汉语、蒙语、满语,与此后的帕拉季(Палладий, Кафаров Петр Иванович, 1817—1878, 第一本汉俄辞典的编撰者)翻译并撰写了大量的关于中国的论著、文章,他们第一次为俄罗斯人解开了中国——这个“亲近且又遥远的世界”之谜。其次,1855年彼得堡大学东方语系的建立,汉学专门人才的培养由此开始。再次,以俄国科学院院士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иев, 1818—1900)为代表的彼得堡汉学家群体和学派的形成。他们是皇家科学院东方学院士罗森(Розен В. Р.)、巴托尔德(Бартольд В. В.)、图拉耶夫(Тураев Б. А.)、奥尔登堡(Ольденбург С. Ф.)、科科夫采夫(Коковцев П. К.)、克拉齐克夫斯基(Крачковский И. Ю.)、符拉基米尔佐夫(Владимирцов Б. Я.)、斯特卢威(Струве В. В.)、康拉德(Конрад Н. И.)等。

瓦西里耶夫时任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的教授、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系主任,著有大量关于中国语言学、文学、历史、地理、文化方面的著作。《汉语语法》(Китай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三卷集《汉语文粹》(Китайская хрестоматия)、《中国历史》(Кита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对北京的回忆》(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Пекине, 1861)都有着

^① Демидова Н., Мясников В., Первые русские дипломаты в Китае. М., 1996; Покровский Ф.,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Монголию и Китай сибирского казака Ивана Петлина в 1618 году. СПб., 1914, 转载自 Романенко А. Д., Китай у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АЛГОРИТМ, М. 2008, С. 8

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外,像季姆科夫斯基(Тимковский Е. Ф., 1824)、科瓦列夫斯基(Ковалевский Е. П., 1853)、韦纽科夫(Венюков М. И., 1874)、斯卡奇科夫(Скачков К. А., 1875)、皮亚谢茨基(Пясецкий П. Я., 1880)等俄国汉学家也在19世纪发表、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文章、论著。

在这百年间,从作家普希金到哲学家恰达耶夫,从批评家别林斯基到哲学家索洛维约夫,从作家冈察洛夫(Гончаров 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2—1891)到大文豪托尔斯泰,一大批俄国作家和思想家都对在东方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一切表示了深深的关注。在他们文学的、道德的、哲学的探索中,在他们文学和哲学创作的思想体系里,中国的精神文化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普希金对中国有着深深的向往:1830年他曾提出随使团来中国的请求,他的藏书中有中国的《三字经》、《赵氏孤儿》、《中庸》等。他也成为中国读者最先结识的俄国诗人。据戈宝权先生考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上海的《俄国政俗通考》就介绍了诗人普希金。他是第一个被翻译到中国的俄罗斯诗人。1907年鲁迅在他的《摩罗诗力说》中更详细地介绍了这位诗人。“五四”以后普希金又是在中国被介绍得最多的诗人。普希金与别林斯基始终关注着普希金撰写的关于中国的文章。第一个到过中国香港和上海的俄罗斯作家冈察洛夫(Гончаров 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2—1891)还写下了介绍中国沿海城市的《帕拉斯号巡洋舰》(Фрегат Паллада, 1858)。

1852年,沙皇政府派遣三桅巡洋舰“帕拉斯号”考察远东。他们从彼得堡出发,经大西洋,绕好望角,过印度洋、太平洋,历时两年抵达俄国远东。作家冈察洛夫随行前往。曾先后在1853年6月到达香港、广州,11月抵达上海。他是第一个到达中国的俄罗斯作家。两卷本游记《帕拉斯号巡洋舰》记录了他在中国的见闻,对中国人民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

进入20世纪,特别是在20世纪后半期,独特的中苏关系,使得俄苏学者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探究达到了从未有过的繁荣,俄罗斯的“经院汉学”在新的百年有了更为深入的成果。作家对中国的记忆也大大丰富和多样了。

20世纪之初,托尔斯泰揭开了俄国作家对中国探究的新的一页。他在1905年12月4日写下了《致张庆桐》的信。他在给中国留学生张庆桐的信中说:“我对中国人民向来怀有深厚的敬意”,“很久以来,我就相当熟悉中国的宗教学说和哲学,更不用说关于孔子、孟子、老子和对他们的著作的注疏”^①。在信中,他不仅对

✓

①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六卷,周圣、单继达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325页。

日、俄两国的狂妄、残暴的掠夺进行了批判,还对清政府的忍让表达了赞美。一年后,托尔斯泰又回复了当时在欧洲享有盛名的中国学者辜鸿铭的来信,对遥远东方的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作出了在我们今天看来仍然相当准确的判断——世界的未来在东方,而东方的未来在中国。“世界公民”托尔斯泰曾通过英、法、德文阅读了大量的有关中国哲学的论著。1909年他还与一位日本学生合作,翻译了老子的《道德经》。他还写下了像《论孔子的著作》、《论〈大学〉》、《中国的贤哲》、《老子的学说》等文章,对中国的哲学和伦理思想有着深深的共鸣。越接近生命的末年,其创作中中国的话题出现得也越频繁,他对孔子、老子的哲学思想,佛教思想尤为关注。契诃夫尽管没有对中国的深入了解与探究,却有着他自己的认知。短篇小说《胖子与瘦子》中瘦子的笑被他称作为“中国人式的”谄媚的笑。这位渴望个性自由、美、和谐和全面发展的俄罗斯作家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心存芥蒂的。

以苏联科学院院士阿列克谢耶夫(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Алексеев, 1881—1951)为代表的20世纪俄罗斯汉学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取得了新的成就,达到了新的高峰。这位世界著名的汉学家、现代俄国汉学的奠基人曾四次到过中国(1907年4月到8月,1909年1月,1912年5月到7月,1926年7月到8月),不仅翻译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还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文化的文章与经典著作,仅生前就出版过280种。比如《在旧中国——1907年旅游日记》(В старом Китае. Дневник путешествия 1907 г.),生前未能出版的文集《中国文学》(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8),《东方学——文章与文献》(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Статьи и документы, 1982)等。它们是俄罗斯中国文化研究的珍贵遗产,也是我们了解20世纪俄罗斯人心中中国形象的珍贵史料。

在19—20世纪之交的“白银时代”,象征主义诗人巴尔蒙特(Константин Бальмонт)、勃洛克(Александр Блок)、阿克梅主义诗人古米廖夫(Николай Гумилев)、阿赫玛托娃(Анна Ахматова)等,现实主义作家布宁(Иван Бунин)等,这些作家、诗人、哲学家从未到过中国,但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始终高昂。古米廖夫写过关于中国瓷器的文章,阿赫玛托娃翻译过杜甫的诗作,涅斯梅洛夫(Несмелов Арсений, 1889—1945),佩列列申(Перелешин Валерий, 1913—1992)等在哈尔滨的俄罗斯侨民作家也翻译过中国的古代诗歌和经典名著。

20世纪初,出现了像小说家多罗舍维奇(В. Дорошевич)的长篇小说《穆祥》(Му Сян, 1901)、戈尔布诺夫—波萨多夫(И. Горбунов-Посадов)的短篇小说《高官的女儿》(Дочь вельможи, 1903)、米特洛波利斯基(И. Митропольский)的中篇小说《小满子》(Маленький Манза, 1913)、马明—西比利亚克(И. Мамин-